

资政要鉴

上

文

化

卷

主编 赵祿祥 赖长扬

古人“言欲以文教致太平”。因此重视发展教育，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教繁荣，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十分必要。这不但能够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事业，还能纯洁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文化卷”集中分析了社会风气的演化，社会思潮的变易，以及文学与史学，教育与教育制度，封建王朝的文化思想政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要鉴

领导干部读史

资政

出版社

资政要览 上

文
化
卷

主编 赵禄祥 赖长扬

中国档案出版社

选题策划：白 勇

责任编辑：刘 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政要鉴·文化卷/赵禄祥, 赖长扬主编.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 - 7 - 80166 - 982 - 7

I. 资… II. ①赵…②赖… III. 文化史 - 中国
IV. 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245 号

资政要鉴·文化卷

ZI ZHENG YAO JIAN WEN HUA JUAN

出版 /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发行 / 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 /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700 × 1020 1/16 印张/50 字数/790 千字

版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28.00 元 (上、下册)

序言

《资政要鉴》以专题的形式，着重深入社会实际，探讨了中国历史治乱兴亡的深层次机理。

中国古代史学，虽说有“鉴以资治”的好传统，但此类著作在探讨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机理时，多着眼于政治，过分强调帝王将相的作用，而对社会思潮的演化动向则注意得不够，这就难免有局限性。《资政要鉴》则对国家兴亡、经济运作、社会构造，乃至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深入地求索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内在原因。

《资政要鉴》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其中，“政治卷”论述了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治乱兴衰的关系两个基本问题；“经济卷”则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以及历代皇朝经济政策的得失；“文化卷”集中分析了社会风气的演化，社会思潮的变易，以及文学与史学，教育与教育制度，封建皇朝的文化思想政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社会卷”是将中国社会史以及相关问题作为史鉴对象的首次尝试。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阶级与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乃至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社会卷”所着力探讨的课题。

《资政要鉴》之所以选择这些专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社会治乱的集中表现，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史实和现象。它不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还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对这些专题所

进行的剖析，不单是一种学术研究，也是一种政策分析和研究。无论是选题还是立意，皆着重于它的史鉴价值。故其撰述宗旨，乃是秉承“善吾师，恶亦吾师”的原则，由“知兴替”而“明得失”。纵观《资政要鉴》的内涵，我们应当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是长期的，分裂是短暂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乃是大势之所趋，民心之所向。所以，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的统治者，凡是认识和把握住统一这个大势的，虽弱而必强，最终取得胜利，反之必败。自西汉之后的历代皇朝，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康熙治国，均无例外。即便是历史短暂的分裂时期，其民心也一直希望统一，反对分裂，这便是统一必然取代分裂的主要原因。究其本源，是因为统一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而分裂割据首先受害的则是广大人民。

二、要保持社会稳定

社会的稳定，是一切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然而，稳定社会的前提在于了解社会，顺应民心，这是为历代盛世所证实了的。首先，要明确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策，其中包括把握社会思潮的演化，民心的向背，制定合理的田赋制度，以及调控各种矛盾，整肃吏治，倡廉肃贪，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针，以加强管理。这方面的史实不胜枚举，如周文王以德治国而天下归心，汉初无为而治则出现“文景之治”，以及唐初的“贞观之治”，清初的“康乾盛世”，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西汉龚遂治北海郡，便是怀之以德，劝民发展生产，因而“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同时，对于对不法分子的严惩，也是顺应民心，稳定社会的重要政策。如西汉时济南豪猾鬲氏家族三百余口横行乡里，官不能治，邳都为济南守，便依法诛鬲氏之首恶，使“郡中不拾遗”而大治。康熙时期的清官廉吏，更是有口皆碑，于成龙一类人物的出现，便成了体恤民情，稳定社会的楷模。

三、要强固经济基础

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稳固，乃是立国之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所以成为中国历代治国安天下的永恒主旨。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稳固经济基础主要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古人对于发展经济有本末之分，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并重本而轻末。但是，从事商贾末业者，其利益远胜过本业的农耕，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民心之浮动，从而危及经济基础的稳固。这就必须调控农商的赋税政策，以发展生产。如刘邦建立西汉皇朝的初期，就颁发了重农抑商的禁令，并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减轻农业税，以刺激农业的发展。唐初的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以“必先利民”为国策，唐宋以后对赋税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农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另外，为了稳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起变法活动，如先秦的商鞅变法和西门豹治邺，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的变法，都是力图稳固国家的经济基础。故历来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用以稳固经济基础。

四、要重视和加强文化教育事业

尊师重教，加强文化建设，其意在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尊师重教和加强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行，不单是提高人们一般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事业，还起着纯洁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使社会运转有序，使中国的优良品德上升到一个相当的水平。为达到移风易俗，纯化人们心灵的目的，中国的先贤们前后相继，不遗余力地做着这项工作。所谓重礼仪，讲文明开始于三代（夏、商、周）。孔子继三代诸贤之后而创立私学，“有教无类”，并整理《诗经》，研究《易经》以及《礼》、《乐》等文化典籍，发展文化事业，起着纯洁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其后，如西汉蜀郡守文翁的尊师重教，就改变了当地文化落后的状况，后世的唐宋乃至明清，一直延续了尊师重教，重视文化建设的优良风气，出现了不少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道学家等，其著名者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程颐、朱熹、皇阳明、汤显祖、曹雪芹

等，不胜枚举。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而精神文明的建设乃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勤劳刻苦、热爱国家、重视人伦、尊老重孝、倡导节气、扶危济困、公而忘私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素养和道德风范的有机组成部分。诸多的先贤们都以道德教化为己任，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为中国古代道德修养和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资政要鉴》的编纂，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史鉴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其意在于力图从社会的更深层次探讨可资借鉴的治国要领。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参加本书编著工作的有：商传、李世愉、田人隆、谢保成、朱耀廷、黎虎、施建中、孙恭恂、曹大为、陈琳国、李树喜、孔繁敏、王培真、史为民、王朝中、刘驰、刘洪波、李宝柱、马宝珠、王建吉、孟世凯、李华瑞、赫志清、魏明孔、陈高华、萧发生、方志远、郭松义、朱浒、任宝菊、李学东、翁殿璧、武四海、岳会仁、李雪屏、王君、张崇发、林吉旺、梁海俊、饶江山、杨祥峰、杨军强、梁洪心等先生。

编 者

2008年12月

目录

上册

“文王演《周易》”新说	(1)
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及精神面貌	(17)
先秦时期关于历史与未来的认识	(28)
百家争鸣的端绪	(46)
战国时期的学术交流中心	(64)
秦汉思想的演变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变动	(83)
汉代教育的兴盛与人才选拔	(111)
经学内部的纷争：今古文之争	(133)
大一统帝国的文史风采	(157)
汉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181)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	(196)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209)
魏晋南北朝的佛与道	(230)
流觞曲水间的魏晋南北朝文人集会	(244)
经学、史学的系统总结	(258)
由鉴戒转向经世的唐代史学	(276)

“三家”并立到“三家”融合	(304)
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	(329)
唐集中“文之将史”的趋向	(347)
唐诗的繁荣	(359)

下 册

值得深思的辉煌艺术	(393)
两宋的新儒家	(413)
宋代教育中的得与失	(435)
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450)
宋词的文化成就	(466)
两宋的士风与文风	(482)
明初的文化专制与沉默的文明	(508)
明代文化的通俗化与通俗化文化	(520)
明代的书院与政治多元化	(538)
明代的科举与八股文	(554)
明代的新儒家与晚明的哲学时代	(580)
晚明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610)
汤显祖与梦中的乌托邦	(629)
明代的四大奇书	(638)
清朝文字狱	(658)
康乾盛世与浩大的图书编纂工程	(678)
乾嘉学派	(701)
清代的西学东渐	(717)
清代不同背景下的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	(736)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	(760)
晚清谴责小说	(776)

“文王演《周易》”新说

历史上关于《易》的起源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记述。由于数字卦的发现，殷《易》的存在得到有力的支持，而“文王重卦”说则受到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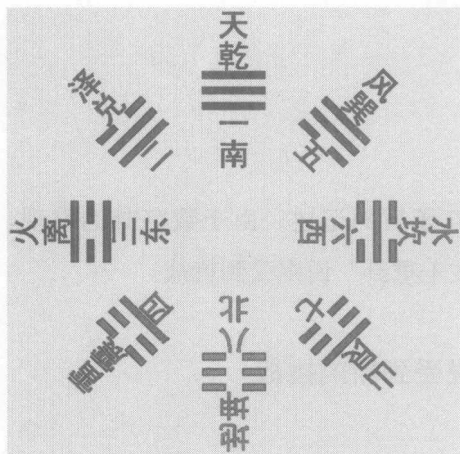
一、“文王重卦”说受到新的挑战

《易》学本是上古以来的文化遗存，它的起源早已模糊不清，后世的史学家和经学家对其起源有种种说法，总的说来，一半依傍传说，一半出于推测。更后来的人们则对其中的某种说法逐渐加以坐实，引为信史。

《周易·系辞传》中引用许多孔子的话，说明《系辞》是孔子后学所作。学者一般将它推定为战国晚期作品，我们且不去深究。《周易·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本是推度猜测之辞。而司马迁（前145—？）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是说司马迁也不敢肯定周文王确曾重卦。至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坐实文王重卦之说，并踵事增华，谓文王更作“上下篇”，尤着意点明《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不寻常特点：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伏羲八卦图（先天图）

对于重卦的起源，学者向来有不同说法，早在司马迁之前淮南王刘安作《淮南子·要略》说：“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认为伏羲是重卦之人。而在司马迁、班固之后，郑玄提出神农氏重卦，孙盛提出夏禹重卦，他们相信三《易》之说，并认为夏之《连山》、殷之《归藏》皆为重卦，因此重卦之人不能晚于三代，于是便以三代以前之圣人当之。这当然是对“文王重卦”

说的挑战。《汉书·艺文志》说文王“作上、下篇”，从其前、后文看，所谓上、下篇即是上、下经，亦即《易经》的卦、爻辞部分。但《易经》爻辞里的某些事情发生在文王以后，于是马融、陆绩等人修正、弥缝其说，提出文王只写成卦辞，爻辞为周公所作。

不难看出，上面关于《周易》起源的种种说法，都是建立在传说加推测基础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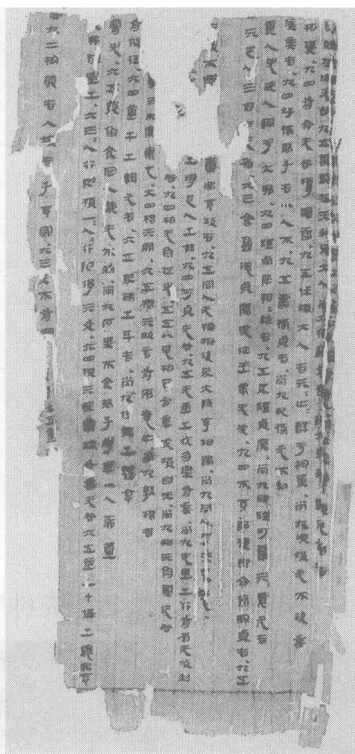
殷代筮数重卦的发现，证实重卦非始于文王。那么，是否可以因此断言《周易》与周文王、周公绝对无关呢？还不能这样看。《周易》的起源是建立在传说加推测的基础上，传说可能有真实的因子，推测也可能有合理的成分，问题是如何分析处理“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传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可能是原来有的传说，司马迁不知其详，做了一个“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错误猜测。班固坐实此说，认同当时《周易》有经、传之分的观点，又将《易经》卦爻辞上、下篇的发明权轻率

地判给了周文王，是错上加错。文王不曾重《易》，亦不曾作卦、爻辞。那么文王所演之《周易》，究竟是怎样一种《周易》呢？



后人根据传说描绘的伏羲画像



马王堆出土的《周易》手抄本

二、“文王演周易”，既讲《易》象又“演德”

有秘府之《周易》，有方术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方术之《周易》用于占筮。秘府之《周易》为文王、周公所作，方术之《周易》与文王、周公无涉。秘府之《周易》，为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而今本《周易》大象部分略当之；方术之《周易》，即今本《周易》卦、爻辞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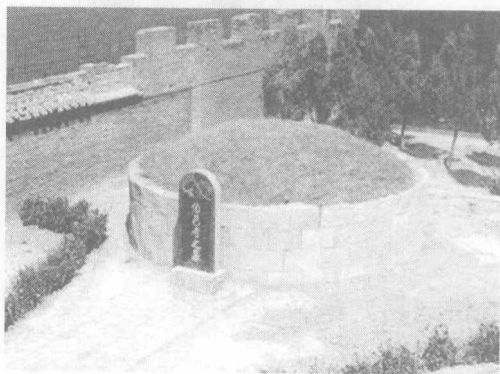
《周易》之“周”，本有二说。一谓“周”为代名，一谓“周”为周普之



周文王

义。孔颖达力主“周”为代名之说：“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①

关于文王演《周易》的传说，另一种解释是文王所演者是“德”。《易纬·乾凿度》说：“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关于《周易》与周室的关系，以此条资料最早而最可靠。鲁昭公二年（前540），当时



文王演易处

孔子只有12岁，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中国人自古有宝爱故籍、尊崇先圣先贤的传统，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宝

爱文王、周公之书是很自然的事。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于此条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

① 《周易正义·卷首》。

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

又说：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问题在于，《易象》是一部什么书？杜预注说：“《易象》，上、下经之象辞。”这话可以有歧义的解释：一是指《周易》上、下经的象辞部分，即大象。如指此而言，那是很有见地的；一是指《周易》上、下经的卦、爻辞，即《周易》的经文部分，如指此而言，则是不合理的，“《周易》经文当时为列国所俱有，韩起没有必要到鲁大史处观览，也不会为之赞叹。”^①那《易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呢？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则此书可以视为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我们可以把韩宣子的话作这样的理解：《易象》由文王创制，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过百里的“小邦周”要战胜统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阴修德行善”，争取与国为国策。羑里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会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意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易纬·乾凿度》说：“演德者文”，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设定不同的处境来建立道德原则的书。这部书后来由周公加以完善，加入了周人君临天下之后实行德治的内容。汉代有不少学者认为周文王、周公参与作《易》之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京氏积算法》：“夫子曰：圣理元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指文王和周公），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易纬·乾凿度》：“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师于姬昌，法旦。”其言孔子“作十翼”的意见不可取，而说孔子师法文王、周公则是有见地的。实际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

^①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生于鲁国，并曾相鲁，他以“述周公之训”为职志，应该亲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①又说：“不占而已矣。”^②应该是就《易象》说的。以往学者对孔子与《易》的关系有过许多讨论，但都没能解释学《易》与“无大过”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从本文观点看，这个问题是简单明了的：因为《易象》是“演德”之书，不是筮占之书，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当然也就会“无大过”。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这种“不占”的易学是儒家之《易》的正轨。后来儒家以用于筮占的卦、爻辞为经，实是沾染方术之习的结果。

那么，《易象》一书是否在今天全部遗佚了呢？并不这样，《易象》的内容可能与今本《周易》大象有某种内在联系。今本《周易》大象部分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较通俗易懂，这可能由孔子及其后学在《易象》的传述过程中加以修饰和润色过。今本《周易》大象的结构由卦画、卦象、卦名、卦义所构成，本身即是一完整意义的“周易”。只是用于“演德”，不用于筮占而已。

饶宗颐做过一个统计，《周易》六十四卦象辞（大象）中直接提到“德”字的有十四卦，他写道：

《易象》的作者，在解释各卦时屡屡以“德”为言，如《坤》象云：“以厚德载物。”《蒙》象云：“以果行育德。”《小畜》象云：“以懿文德。”《否》象云：“以俭德避难。”《豫》象云：“以作乐崇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子路》。

德。”《蛊》象云：“以振民育德。”《大畜》象云：“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象云：“以常德行习教事。”《晋》象云：“以自昭明德。”《蹇》象云：“以反身修德。”《夬》象云：“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升》象云：“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渐》象云：“以居贤德善俗。”《节》象云：“以制数度议德行。”^①

至于其他数十卦如《乾》象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屯》象云：“君子以经纶。”《讼》象云：“君子以作事谋始。”《师》象云：“君子以容民畜众。”等等，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字，但也无疑在教导“君子”应具备某种德行。这说明《周易》大象既是讲《易》象的，也是“演德”的，是合乎文王、周公的《易象》精神的。

三、“崇德”是西周的社会思潮

韩宣子见《易象》，便赞叹由此而知“周之所以王”；文王演《易》，又被称为“演德”。这其中究竟隐含着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不了解殷周之际的社会背景，就很难理解其中的深义。

《淮南子·要略》指出：“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剗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殷商的意识形态是天命神学体系，殷人迷信上帝鬼神的神秘力量，事无大小都要向神问卜。殷人并且相信上帝也是他们的祖先神，是专门庇佑自己子孙的，而无论这些子孙做得怎样。商纣王虽然危机四伏，却不屑一顾，有恃无恐，说：“我生不有命在天！”^②

周为小邦，要实现“翦商”的战略目标，其卓有成效的政治方略就是重人事，修道德。《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放归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周人联合诸侯的政治方略是“阴修德行善”。修德行善本是光明正大之事，太史公妙用一

① 《天神观与道德思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十九本一分。

② 《尚书·西伯戡黎》。



占卜用的甲骨

“阴”字，亦在点出其政治的方略。

武王克商后的政治形势也不容乐观，一方面要收附“殷之顽民”，一方面要统治广大的疆域。当时分封同姓子弟到各地，实行分治，由此形成新的诸侯国。这些新的统治者一方面要统治当地的人民，一方面负有藩维王室的义务，由于当时的统治力量分散而薄弱，所以召公、周公告诫周初统治者：“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①。统治者要勤恤小民，应以民心为天命。周公亦告诫统治者：“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

恭明德”，“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②。意思说，命不易保，天难谌信，要不想“早坠厥命”，就要继承前人的“明德”。

西周王朝的统治者以及分封到各地的周姓诸侯，面临着一个集体境遇，即“顾畏于民畀”（小民虽微，至为可畏），而以修德自儆，以防止“早坠厥命”，因而他们对道德的追求，有着十分实际的现实考虑。也因为如此，“崇德”成为西周的社会思潮。

古文字专家指出，“德”字是周代金文中的常见字。却极少见于殷代卜辞中，这也正反映“德”是周人的观念。饶宗颐教授曾列举周代鼎彝器物上常见的“正德”、“敬德”、“明德”、“元德”、“秉德”、“政德”等套语，这也反映西周是一个喜爱歌“功”颂“德”的时代。

“德”字从心从直，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二：“直，正见也。”德的本义是正见于心。《说文解字》卷十：“惠，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内得于己，可以理解为提高、完善自己；外得于人，可以理解为得人心以得天下。西周时代，道德在政治上体现的完全是正面的意义，这时讲“道德”并不意味着

① 《尚书·召诰》。

② 《尚书·君奭》。